

從香港的「兩文三語」發展淺析臺灣中小學 推動雙語政策之問題

黃卓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為配合國際間日漸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政府提出「2030 雙語政策整體推動方案」，以「培育臺灣人才接軌國際」為願景，提升在臺灣在區域乃至國際上的競爭力。為達到這個目標，教育部早於 2020 年就大幅提升投入發展雙語教育政策項目的預算，藉此推動臺灣學生英文能力的提升。可以看出，政府目前把提高學生英文水平列為重要的政策發展目標，這不僅有助於提升國際競爭力，也將對個人的全球視野和就業機會產生深遠影響。但是，臺灣在發展雙語政策仍在初期階段，參考鄰近的國家或地區的語文教育政策發展路線，將對政策實踐方向有積極的啟示作用，也能夠為提前應對社會對相關政策的負面反應。

一直以來，推動雙語政策較為成功的國家或地區一定會談及香港及新加坡，除了她們均曾受英國殖民統治外，其教育水平也一直位於亞洲的前列，不少學者及研究均認為這是其具有全球化視野及國際化的語文教育政策推動而達至的。但是，筆者稍早的研究也發現相關政策在實踐時也為當地的社會和教育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雖然實行雙語政策確實能夠提升當地的英文水準，但對母語發展卻存在負面影響，導致不少社會問題的產生（黃卓明，2024）。

二、香港語文政策的制定背景

香港現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其中一個特別行政區，人口超過 90% 為華人，是族群相對單一的地區，而大部分香港華人的常用語言是廣東話，日常溝通也是以廣東話為主。由於香港主權已在 1997 年移交予中國，而普通話是中國的法定國家通用語言，故推廣普通話教育成為了香港主權移交後的主要語文教育政策之一。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特區成立後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及：「所有中學畢業生都能夠數學流暢的中文和英文，並有信心用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與人溝通」，確立了「兩文三語」（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語文教育政策的基礎，及後的「普教中」和「母語教學」均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下而推行。田小琳（2020）認為，「兩文三語」尊重和配合香港語言使用習慣，將推廣普通話「在地化」（Localization），是強調「一國兩制」的體現。

同時，由於香港自 1990 年代起便逐漸演變成一個知識型經濟主導的社會（Knowledge-based Economy），語言也成為了促進經濟的工具，體現了語言的工

具性。香港發展蓬勃的經濟產業，如金融、運輸物流業及旅遊業等，一般需要個人運用較高的英文能力在處理文件、客戶溝通等不同方面。施仲謀（1997）研究發現，調查中有 70% 的學生認為學習良好的英文能力夠符合香港社會的需求，並且具有實用性，這顯示英文在香港當地存在「經濟」和「市場」價值。

由此可見，香港的語文教育政策具同時照顧了本地認同、國家及國際化的特徵，在滿足不同領域、不同方面需求上發揮了關鍵作用，推動了當地教育、經濟及娛樂等不同產業在國際上成功發展（楊聰榮，2002）。

三、對當地教育的影響

香港的「兩文三語」政策期望學生能夠書寫良好的中、英文，說好英語、廣東話和普通話，形成一個「三語社會」。以中文為例，香港的中文，說的是廣東話，屬於廣府片（許名瀚，2023），而寫則要求符合現代漢語規範，這一種學習環境會對學生的語文學習效果產生負面影響（施仲謀，1997）。為此，課程發展議會（1999）提出以「用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作為課程遠期發展目標，期望通過此政策提升港人的中文能力。所謂「普教中」，就是將中文課的教學語言以普通話替代廣東話，不少支持者認為這樣能夠消除兩種語言間的負面影響，讓學生學習中文能夠有明顯的進步（鄧城鋒，2008）。但是，在「普教中」政策推行 10 年後，語常會的追蹤研究卻指出：「研究結果未能證明『普教中』對中文學習有促進作用」（香港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研究計劃小組，2015），也就是說，研究未能斷言「普教中」對學習中文有明顯的好處，其成效還有待進一步釐清。事實上，參與「普教中」的學校數量自 2015/16 學年開始出現下降的趨勢，截止至 2020/21 學年，「普教中」學校的數量減少了超過 40 間（港語學，2021）。由此可見，「兩文三語」政策需要達至預想的目標，還有一段距離。

誠如上文提及，英文在香港社會一直因其工具性備受追崇。當「兩文三語」政策確立後，《第 6 號報告書》和《中學教學語言指引》多次重申母語教學的重要性。香港的「母語教學」實際是指「使用中文作為授課語言」，期望以學生最熟悉的語言來教學而提升教與學的效果（田小琳，2020）。自 1998 年起，所有官立和津貼中學需要實施中文授課，僅有 110 多間學校繼續準以英文作為教學語言，大部分學校都需要以學生成績優異作為條件，換言之香港有 3/4 的中學「被迫」使用母語教學（許玉麟，2019）。然而，此政策卻導致形成了精英學校的「名牌效應」和「標籤效應」（張文光，1999），中學自始被貼上標籤，被劃分成較高等的「英文中學」和次等的「中文中學」（楊聰榮，2002），產生了學校「成績好」等於「以英文教學」的社會風氣。這是因為香港家長一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夠「學好英文」，故一間以英文作為教學語言的學校便成為其擇校指標之一，形成較強市場導向。2009 年，教育局宣佈實施「教學語言微調政策」，不再劃分「中中」

（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的中學）或「英中」（以英文作為教學語言的中學），高中開放學校自由選擇教學語言，而初中則被允許有 25% 課程可選擇以英文授課。惟許玉麟（2019）續指，教學語言似乎「一面倒」地傾向英文，微調方案仍未能淡化教學語言政策帶來的「標籤效應」，教育依然被市場導向所主導，未能發揮「母語教學」的優勢。

四、社會對政策的反應

香港的「兩文三語」政策實行 20 多年來，產生過不少爭議，不能忽視的就是社會討論母語發展的問題（許寶強，2014；胡傑、陶慧怡，2019）。香港政府自 1999 年起積極推行「普教中」，明確指出以普通話作為中文科的授課語言作為長期發展目標，一部份人認為通過普通話學習中文能夠提升其在此範疇的能力，持反對意見的人則指出廣東話的發展問題被忽視，故社會對此問題一直有不同反應。

梁慧敏（2017）指出，不同學者都會曾借用「高低語言」的思維解讀「兩文三語」的發展，不同語言會在功能上呈現明顯的分工，通常會存在一種被視為地位較高的「高語言」，常用於正式場合和體面場合。同時也會有一種「低語言」，主要用於非正式場合或私人交流，而普通話則被期望逐步定位為政治和行政管理的主要語言（黃谷甘，1997）。在梁的研究中也明確指出普通話的普及與滲透程度在香港社會仍然極為有限，其明言，儘管近年來普通話的使用率正在逐步提升，但它仍未成為香港人的主要日常語言。相比於在工作和非工作場合中普遍使用的廣東話以及較常用的英文，普通話在整體使用頻率上明顯處於弱勢地位。普通話在大多數日常情境中的平均使用頻度介於「從不使用」到「極少使用」之間。這表明，儘管政策上大力推廣普通話，但它在實際生活中的滲透和普及程度仍然有限，尚未與英文及廣東話一般具主導性。

此外，陳瑞瑞（2017）認為，現時香港學生的普通話水平有顯著的提高，但「說普通話」卻被視為「禁忌」。社會上會因為不滿政府語文政策，而出現「保衛粵語」的聲音和行動，以強調廣東話與香港的聯繫。在此問題上，有不同組織曾舉辦推廣粵語活動、統籌「普教中」對學生學習成效的研究，甚至有主流報章使用廣東話拼音撰寫文章，藉此從文化和學術等不同層面上，以非暴力的方式透過網絡、媒體傳播反對政府推廣普通話政策的意見，實行「軟對抗」；2016 年，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通過了一項無約束力的議案，取消「普教中」作為長遠的目標，而政府也將是否使用「普教中」的決定權交由各個學校自行決定，這反應了社會上一部分人士對「普教中」仍抱持著抗拒的態度，不希望普通話代替廣東話成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一些激進的學生甚至會因反對大學設「普通話」為必修作為畢業要求的政策，而發起佔領行動；在一些社會運動期間，出現了示威者

對講普通話的民眾進行辱罵與侮辱的情況，這導致原本不習慣使用普通話的香港人對普通話產生了更加消極和抗拒的態度，甚至部分人會出現排斥心理與歧視心態（黃晶榕、林金丹，2022），這也表明了部分香港人對普通話仍缺乏認同感，存在負面情緒。

五、對臺灣發展雙語政策的啟示

上文討論了香港「兩文三語」對其教育及社會的影響，可以從中歸納出語文政策的發展過程中可能會有兩大問題需要面對：(1)英文學校形成名牌效應，英文成為「精英語言」；(2)母語發展逐漸被忽視，社會矛盾日益增加。

根據香港的語文政策發展，可以預視英文會因為其工具性逐漸被家長推崇，他們也會優先選擇 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和 EMI（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等使用雙語教學模式的學校，而市場導向也會使得這些學校形成「名牌效應」，認為這些學校出身的就是「精英」，英文能力好，使一些因城鄉發展、師資水平等問題而未轉型成為雙語教學的學校則被貼上「標籤」，認為這些學校水平不佳，加劇城鄉教育發展不均的情況。事實上，黃琇屏（2021）曾對臺灣公立中小學雙語教育實施現況進行研究調查，發現離島地區實行雙語教學的學校比例偏低，如澎湖縣不足 20%，金門縣也只有接近 17%，相較於北部地區臺北市的超過 68%、新竹市的接近 50%，這兩個區域的雙語教學實施程度差距頗為明顯。值得注意的是，臺東縣僅有不足 2%的學校實行雙語教學，這也再一次表明了偏鄉地區學校難以跟上大都會區的教育發展。從這一數據來看，出身與離島或偏鄉地區的學生，可能會被標籤，認為其較城市學生的語言水平弱；以擇校的角度來解讀，有能力的家長也會更願意將學生送到北部的學校就讀，加劇其他地區的人才資源往北移的問題，擴大雙語教育的城鄉差距，導致學生學習成就出現進一步的落差，對臺灣整體教育發展存在負面影響。

此外，母語發展問題也應該被關注及重視。從香港的事例也可以洞悉在實施雙語政策時，可能會忽視本地母語的發展，導致社會產生不滿的情緒。臺灣各族群的母語各有不同，除華語外，臺灣臺語是目前使用率和人數最多的語言（行政院，2019），政府也 2019 年公佈施行語言發展法，期望以立法的方式改善語言斷層情況，表達尊重多元文化的發展的態度。在 108 課綱下，小學階段的語言領域中，除了必修的華文和英文課程外，學生還可以自由選擇學習一門本土語言或新住民語言，母語似乎越來越受到政府的重視。但是，在雙語政策下，一部份學校把英文當作「第一語言」來教學，地位似乎甚至比母語更高（McClean-dreyfus，2015）。誠如上文所述，英文在日益全球化的社會中彰顯了重要的工具性，而臺灣社會也對華語有着工具性的依附（陳依玲，2008），故華語和英文在學生的學習取態上具有優先地位，而其對母語學習的興趣和意願也會因為這兩種語言的強

勢和重要性而減弱，這間接壓抑了母語的發展及保護。陳依玲（2008）曾就臺灣母語教育的現況進行研究，其指出母語是不同族群的重要標識和特徵，本土語言需要得到維護和保護，而人們也希望使其能夠在公共場合得到更廣泛的使用。因此，在臺灣本土語言意識日益提高的情況下，政府需要有意識地通過立法及調整課綱等形式增強學生對母語的重視和意願，不能忽視雙語政策的發展過程中對母語帶來的負面影響。

六、結語

臺灣在推動雙語政策的實施過程中，要注意英文主導的情況，避免社會產生「英文優先」的風氣，導致雙語學校形成「名牌效應」，加劇教育市場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進一步拉大城鄉教育發展的差距，不利臺灣教育的整體發展。因此，除了政府需要加強偏鄉雙語師資的培訓，增加對學校及教師補助外，學校更應審視學生的需要，不要盲目改用英文授課進行授課以追求「全英文授課」的光環，而應該制定調整教學語言規劃，當校內的雙語師資、教材達至一定百分比後，才循序漸進的調整教學語言。

同時，香港的「兩文三語」政策也顯示，過度強調英文及普通話的發展，可能會對母語造成負面影響。因此，臺灣在實踐雙語政策時，需要審慎考慮這一點，兼顧本地語言的地位和發展，避免出現母語逐漸被忽視的情況。張學謙（2020）指出，雙語政策以往會採取透過區分不同學科而選擇使用不同語言，以區隔語言的分離式雙語觀實行。課堂上嚴格的區隔語言，實際上是發展單項語言能力，較難在學科上進行跨語言實踐。因此，我們可以在不同學科融入母語，使其作為輔助教學語言，除了讓母語發展成知識語言，在教育層面上擴充其功能之外，也能夠建構母語和學習語的互動，學生在透過語言學習的同時，也能夠學習母語。這樣能夠使得兩種語言靈活互助，從而提升母語在教育層面的空間和地位。

總括而言，臺灣在推行雙語政策的道路上，面臨着平衡本地語言認同、提升國際競爭力，以及關注和化解政策實施中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等諸多挑戰，以整體社會利益作為依歸才能有效促進政策目標的實現。

參考文獻

- 田小琳（2020）。香港「兩文三語」政策的制定與實踐。香港：城市大學。
- 行政院（2019）。《國家語言發展法》—改善語言斷層危機、尊重多元文化發展。臺北：文化部。

- 施仲謀（1997）。香港漢語言文字教學的現狀與展望，**語言文字應用**，23(3)，45-54。
- 胡傑、陶慧怡（2019）。**母語**。香港：中文大學。
- 香港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研究計劃小組（2015）。**探討香港中、小學如何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研究計劃終期報告**。香港：語常會。
- 張學謙（2020）。母語優先的臺灣本土語言復振教育規劃，**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5(1)，175-200。
- 梁慧敏（2017）。香港普通話使用的實證研究，**語言文字應用**，3，79-90。
- 許玉麟（2019）。全球化衝擊下香港教育改革二十年的市場化現象，**香港教師中心學報**，18，15-28。
- 許名瀚（2023）。論粵語在香港法律中的地位，**中國語文通訊**，102(1)，113-130。
- 許寶強（2014）。**廣東話授課與情感的教育**。香港：中文大學。
- 陳依玲（2008）。語言教育政策促進族群融合之可能性探討，**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4(3)，28-46。
- 港語學（2021）。**全港中文科教學語言資料庫2020/21年度普查結果**。取自 <https://sites.google.com/site/hklangstudies/結果摘要202021>
- 黃谷甘（1997）。「九七」回歸與香港語文芻議。**廣東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88-91。
- 黃卓明（2024）。《香港與新加坡的語文教育政策對當地社會和教育的影響》。載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主辦之「**2023年臺灣校務研究國際研討會－國際人才培育與永續發展**」論文集。
- 黃琇屏（2021）。公立中小學雙語教育實施現況與挑戰，**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0(12)，6-11。
- 黃晶榕、林金丹（2022）。香港學校推廣「普教中」的現狀、挑戰與出路，

紫荊論壇。

- 楊聰榮（2002）。《香港的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兼談香港語言政策對客語族群的影響》載於淡江大學主辦之「各國語言政策研討會：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論文集。
- 劉琳（2017）。廣東話 vs 普通話：當香港的語言遇上政治。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0439847>
- 鄧城鋒（2008）。關於「普教中」討論的反思，*基礎教育學報*，17（2），20-29。
- Mclean-dreyfus. M.（2015）。微觀語言政策—換一種角度看臺灣的母語角力。取自 <https://whogovernstw.org/2015/05/08/marie-alicemclean-dreyfus1/>

